

出版人：董 伟
策划编辑：陈志明
责任编辑：银 河
陈志明
特约编辑：韩建国
责任校对：何 南
封面设计：博凯设计
13910295729

在21世纪，我们人类应该认识到西方自然科学带来的弊端。认识固然重要，但重要的是行动。东方的思想，我们没有很好实践。21世纪，需要我们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不仅能够“知道”，并且能够“行动”。我们要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，再把人类文化提高一步。我是说东方文化要重现辉煌。

——季羨林

* JIXIANLIN JIANGYANJI *

上架建议 | 社科·人文

ISBN 978-7-5115-0195-0



9 787511 501950 >

定价：42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文化与人类发展前途：季羨林讲演集 / 季羨林著 .
文明国编. 北京：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1.1

(中华文化复兴方阵·名家讲演系列)

ISBN 978-7-5115-0195-0

I. ①东… II. ①季… ②文… III. ①季羨林 (1911~2009)
一文集 IV. ①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7910号

书 名：东方文化与人类发展前途：季羨林讲演集

作 者：季羨林

编 者：文明国

出 版 人：董 伟

责任编辑：银 河 陈志明

装帧设计：博凯设计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：100733

发行热线：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：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：(010) 65369533

网 址：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6开

字 数：230千字

印 张：21.5

印 数：0, 001—5, 000册

印 次：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5-0195-0

定 价：42.0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1979年8月

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 1

——在乌鲁木齐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

1980年9月

关于《大唐西域记》 17

——在西安所作的学术讲演

1982年7月

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 37

——在国家教育部举办的“东方文学”讲习班上的报告

1982年10月

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三次理事(扩大)会议闭幕词 47

1983年5月

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55

1984年5月

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63

——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所作的专题讲演

1984 年 10 月

在印度两大史诗讨论会上的讲话(摘要) 75

1985 年 10 月

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
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81

1986 年 9 月

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七个问题 85
——在“全国首届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”上的发言

1987 年 3 月

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97
——在民盟中央举办的“多学科学术讲座”上的讲演

1987 年 8 月

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131
——在“东方文化系列讲座”上的报告

1987 年 8 月

CĪNĪ 问题: 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145
——在“东方文化系列讲座”上的报告

1988 年 5 月

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157

1988 年 7 月

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65
——关于“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”的讲稿

1991 年 4 月

纪念泰戈尔诞生 130 周年逝世 50 周年

大会上的发言 181

1991 年 6 月

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南亚文化研究所

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89

1991 年 9 月

在“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”

上的讲话 193

1992 年 12 月

在“纪念北京大学《歌谣》周刊创刊七十周年

暨俗文学学术讨论会”上的讲话（摘要）..... 203

1993 年 3 月

专而又通的榜样 207

——在“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”国际学术
讨论会上的发言

1994 年 4 月

中外文化交流漫谈——从西域文化的传入谈起 211

1994 年 9 月

长城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221

——在北京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

1994 年 10 月

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225

——在中山大学举办“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”上的发言

1994 年 10 月	
在中国亚非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	235
1995 年 5 月	
西方不亮，东方亮	245
——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所作的学术讲演	
1996 年 8 月	
东方文化要重现辉煌	253
1997 年 10 月	
对 21 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	257
——在“面向 21 世纪的人文学科建设 暨季羨林学术思想研讨会”上的讲演	
1997 年 10 月	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	281
——在聊城师范学院的长篇讲话	
1999 年 3 月	
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	297
——在“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： 人的素质学术研究会”上的讲演	
1999 年 11 月	
一个真正的中国人，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	307
——在“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的讲演	
2001 年 9 月	
科学应该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	317
——在“重视社会科学，提倡创新思维”小型座谈会上的发言	
附录：季羨林先生大事年表	321
编后记	333



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

——在乌鲁木齐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

◎时间：1979 年 8 月 29 日

◎地点：乌鲁木齐

本文系季羨林先生 1979 年 8 月
29 日在乌鲁木齐学术报告会上的报
告。

同志们，今天讲的题目是《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》。

过去几十年，我自己研究的范围，有的是同新疆有直接的关系，有的是同新疆有间接的关系。所以，我过去看了许多关于新疆的文字，不管是历史的，政治经济的，看了许多。所以形成一个概念，感到新疆整个地方是个宝地。在中国只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在全世界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。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同志们听完以后，便可以找到答案。

新疆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个宝地？世界的文明，中国的、古代希腊的、古代印度的，统称世界三大文明。这三大文明碰头的地方，汇合的地方，就在新疆。

各种语言，即印欧语系的语言，塞姆系的语言，同许多别的语言，在新疆汇合。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。

文学、艺术、宗教，也是这种情况。世界三大宗教，伊斯兰教、佛教、基督教，也都在新疆汇合，互相影响。这样一种情况，在世界各地也是找不到的。所以，我感到新疆这个地方对于研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关系，材料非常丰富。当然不只限于新疆，还有日本和南亚，可是新疆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是一个关键的地方。

最近，我感觉到，从整个世界来讲，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的倾向：一个叫做综合的研究，就不是一门的学问。语言学是一门，艺术文学是一门，政治经济学是一门，历史是一门。所以谓之综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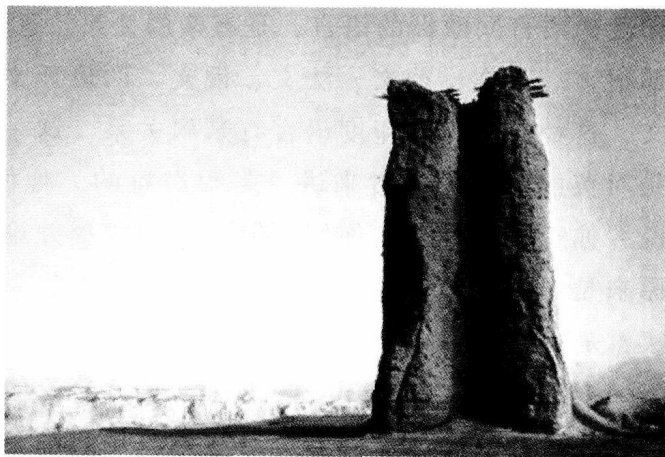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在国际上兴起了两门新的学科。一个叫敦煌学，一个叫丝绸之路学。这敦煌，同志们知道，跟新疆也有关系。丝绸之路，一大段是通过我们新疆的。这个学科是综合的。它即包括政治经济，又包括历史、宗教、文学艺术和语言。这种学科，当今在世界上，特别是在社会学科方面，比较突出。再一个就是比较的研究。是比较语言学，是比较宗教学，比较神话学，比较文学。这种比较的研究，现在在世界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势。一个综合的研究，一个比较的研究，这是当前世界上社会科学两大主要潮流。可是呢，要讲条件，不论是进行综合研究，还是进行比较研究，新疆是最好的地方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刚才讲的。各种宗教，各种艺术，各种思想，各种语言，在古代，在新疆就有汇合。过去，我没来过新疆，这是第一次到这里来。感受到新疆确实是一个好地方。这个地方大有发展前途。我们回去以后，要给新疆鼓吹鼓吹，让更多的同志到新疆来，看看这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，看看这里的考古工作，社会科学研究。现在我就从语言方面，选两种语言，来和大家谈谈。

一个叫吐火罗语，一个叫尼雅俗语。这两种语言都与新疆有关系。不过这种语言，过去谁也不知道。80年代以前，世界上不知道有这种语言。我们新疆在地底下掘出很多残卷就是用这种文字写的。因此，人们才知道，世界上有这种语言，以前是不知道的。这两种语言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没有的，它出现在我们新疆。因此，我就把这两种语言选出来，把大概的情况给同志们讲讲。最多只是一些常识吧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内容。

第一，讲吐火罗语。

先讲名称问题。吐火罗的名字对不对？同志们知道，我们这个世纪，也就是20世纪的初年，外国人、欧洲人在新疆进行发掘找出许多东西。吐火罗语用的字母，就是婆罗米字母。从左向右撰写的，字母大家认识，可是语言呢？大家不懂。同志们知道，现在的拉丁字母，英文使用拉丁字母，法文、德文也都是用拉丁字母。我们认

识字母，不一定懂语言。对于吐火罗语呢？字母认识了，不懂这个语言。所以，当时，德国人劳于曼 Erust Leumann (leumann)，他给这种语言一个名称，叫第一种语言，但并不知道是什么语言。到了1907年，德国的一个学者叫缪勒 (F.W.K.Muller)，他把这种语言叫做吐火罗语。1908年，另外两位德国学者西克 (E.sieg)、西克灵 (W.siegling) 他同意这个名称，叫做吐火罗语。到了1913年，法国的一个学者叫列维 (Sylvain Levi)，他认为吐火罗语 B，应该叫龟兹语。到了1921年，西克、西克灵就把吐火罗语 A，照了照片出版了，出版了婆罗米原文，还用拉丁字母标音。到了1931年，西克与西克灵出版了吐火罗语语法。这中间，从1907年，到1931年，才出版了吐火罗语的语法。所谓吐火罗语法，实际上是吐火罗语 A，吐火罗语 B 很少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吐火罗语 A 的残卷的大部分，是保存在德国的柏林。B 的残卷，即列维称作 B 的残卷，就是列维称作龟兹语的残卷，基本上在巴黎。德国人和法国人各霸一方，而且封锁资料，不给对方看。到1936年，英国一个学者叫白雷 (H.W. Bailey)，他认为，A 应该叫做“焉耆语”，B 应该叫做“龟兹语”，主张不要吐火罗语这个名称。结果引起一场笔墨官司。西克、西克灵坚持用吐火罗语。其他国家，特别是法国和英国则认为吐火罗语的



龟兹古国遗址

叫法是不对的，应该把 A 叫做焉耆语。把 B 叫做龟兹语。到了最近，又过了几十年了。看来吐火罗语这个名称不恰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讲的情况，跟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讲的，不大符合。所以呢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样呢？还不敢说。我自己倾向 A 叫焉耆语，因为残卷在我们的焉耆县发现的。龟兹语，是在库车发现的。根据地方，起这个名字比较恰当。但是，这里也有个问题。是个什么问题呢？因为这两种语言确实很相像。叫做吐火罗语 A、B，人一看，就知道都是吐火罗语。它们很相像，很相似，差别不是那么大。叫做焉耆语或龟兹语呢，就看不出这样的关系了。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呢，现在还不清楚。这里主要把吐火罗语的名称的来源稍微地给同志们讲了讲。

第二个问题呢，讲讲吐火罗语的发现对我们中国，对世界科学研究有什么意义。也就是吐火罗语发现的重要性。这里我要讲两个问题：一个问题呢，是从比较语言学来看这个问题。我们平常讲的比较语言学，实际上是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。

印度在东方，欧洲在西方。最初，无论是印度人，还是英国人、德国人、法国人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。而且西方人瞧不起印度人，以为他们皮肤颜色是黑的，说，你们是被我们征服的，是殖民地，是瞧不起的。后来呢，一些欧洲人发现，从语言来看，印度的语言同欧洲的语言，是有亲属关系。这个例子，我不必举了，那很多。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俄文、西班牙文、意大利文、葡萄牙文，这种语言，跟印度语言有亲属关系。这一点对英国来讲，特别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来讲，是很尴尬的。他们原来瞧不起印度人，说，你这是低等人，你们不能跟我们相提并论。结果呢？发现他们原来是亲戚，原来是一家人。所以英国人很尴尬。这个没办法，事实就是这个事实。

语言和民族是不是一码事？这是有争论的。我的看法是，语言和民族不能划等号。有的民族它就改用别的语言，这很少，不能划

等号。不过，就印欧语系来讲，它这个语言和民族，应该划等号。有过这么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最早在 16 世纪，一个意大利牧师在印度果阿传教，他就发现了印度语言跟意大利语言，跟欧洲语言有亲属关系。

到 1786 年，一个英国人叫詹姆斯，他认为二者处于同源，印度语言和欧洲语言是一个来源。他正式提出来了。到了 19 世纪，整个世界，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，就是比较语言学。刚才讲了，比较语言学，实际上是印欧语言的比较语言学。所以，后来别的语系就反对，说这个有点霸道。说一个印欧语系怎么能叫做比较语言学呢？应该叫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。赛欧语系也可以叫做比较语言学。现在一般讲，比较语言学，都指的是印欧语系。

19 世纪整个世纪，德国人、法国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，一方面，对印度语言，另一方面，对于欧洲语言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，明确无误地证明，这两种语言，确实是一个来源。毫无问题。他们发现一些规律，整个 19 世纪，这方面很突出。恩格斯当时跟马克思有一个默契，说我们两个分工，马克思专搞政治经济，恩格斯搞军事和语言。恩格斯对 19 世纪当时发展起来的比较语言学是重视的，作过些研究。而且我看他的日记和信上都讲到，恩格斯学过梵文。

当时呢，大约得到这么个结果。就是，印欧语系的很多民族：法国人、德国人、意大利人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始祖，来源于共同的祖宗。可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呢，发现有这么一种情况，就是，有一支是西支，还有一支是东支：欧罗巴是西支，印度是东支。发现东支和西支是不一样的。他们用一百这个词，西支的叫它为 Centum，东支的叫它 Satem。他们从音变规律归纳出这么几点来。他们认为这个 S 和 C 是来源于一个共同的，就是原始印欧语系的一个音，后来呢，就发展成了这么两派。它作为一种代表，并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。当然它有它的音变规律。结果呢，是这样的。比方说在东方，在印度，一百叫 Sida，或者 Cida，俄文也是东支的，叫 Com。当时，

在 19 世纪研究的结果，好像东、西分得很清楚，音变规律分得很清楚。在我们看起来，也很自然的。那么这种语言的起源地在什么地方呢？曾引起很大的争论，这里不必详细讲了。就是印欧，一个印度，一个欧洲。它原来是一个来源。这个来源在什么地方，争得很厉害，现在也没有结论。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，没有结论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但是到了希特勒，他说印欧语系的老家就是德国，那时胡扯八扯，人们一笑置之。因为他希特勒讲的不是什么学术，所以这个争执得很厉害。各有各的一说，而且写得很多，汗牛充栋。到现在还没有结论。我不详细讲了。

原来呢，这个结论被认为没有问题。因为在西方，都属于 Centum 这个系统，在东方呢，都属于 Satem 这个系统。没有问题，好像天下太平了。可是吐火罗语出来以后，麻烦了。吐火罗语出现于我们新疆。这是东方，这不成问题吧。出在我们新疆。吐火罗语称一百为 Kant，这样一来，用旧小说的话，就叫做阵法错乱。讲不通了。可原来很清楚，条条有理，头头是道，很清楚。后来发现吐火罗语的一百是 Kant，所以引起阵法混乱。当然，阵法混乱不是个坏事情。科学研究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，不能要求不动。它的变动是必然的。所以一提出这些问题来，当时欧美的跟东方的学术界有点陷于混乱。这是不成问题的。因为解释不清楚。这问题提出来以后呢，深入钻研。这问题到现在并没有解释清楚。什么时候解释清楚呢？不敢说。不过我感觉一统天下，天下太平并不是好事情。所以，我讲吐火罗语发现以后，影响了很多，提出了许多新问题。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把印欧语系过去的分法给冲乱了。这个问题没法解决？到现在也没有解决。这问题跟印欧语系的老家到底在什么地方连在一起。这个问题没法解决。越钻这个问题越复杂。可是越复杂呢，越深入。不是坏事，是好事情。即吐火罗语的发现对我们的学术有促进作用。要不要提出这个问题呢？大家以为已经解决了，泾渭分明，清清楚楚，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想讲一讲吐火罗语发现以后，就是我们新疆的焉耆语、龟兹语发现以后，对中国跟印度的文化交流，对佛教的传布有什么影响？

就我自己的看法，也是有很大的影响，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了。过去呢？大家都习惯于这样讲，说佛教是汉明帝时传入的。现在，一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，都不承认那是事实。汉明帝夜梦金人，于是派人到西方去学习。那是不能成立的。可是有一个问题，始终也不很清楚。就是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，通过什么途径，是直接传来的呢，还是间接传来的？这个过去有不同的意见。根据我自己的看法，根据最近几十年的发现，特别是新疆的发现，看来最初，中国有一个媒介。这个媒介，就现在来讲，就现在的知识面所达到的范围来讲，可能就是说吐火罗语的人。

在这里，我再插两句。新疆古代究竟有多少语言，我们现在也说不清楚。从20世纪初年到今天，快八十年了。欧洲人，日本人，美国人，在我们新疆弄走了不少东西。解放以后，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研究。材料很不少。研究的结果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呢？八十年，够长的了。据我的看法，差得很远。刚才我讲的，新疆这个地方的科学研究大有发展前途。八十年解决不了，再来个八十年，还解决不了。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孙子辈，也是解决不了。所以，我说新疆的科学研究，大有发展前途。二三百年间，我们的工作有得做。我相信将来我们的发现会越来越多，这是不成问题的。前些年，在柏林，我到他们的民族博物馆去看过。有些他们已经认识了，比如吐火罗语已经搞出来了，基本上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还有一部分残卷，也是从新疆搞去的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语言。字母认识了，是婆罗米字母，语言不清楚。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边讲的，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水平，绝对不少。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讲的语言，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多。所以，很可能还有新的语言发现。有的是已经掘出来的，我们不认识，不知道是什么语言，有的还没有掘出来，

所以，新疆这个地方，从科学研究来讲。大有发展前途。一百年、二百年，问题搞不清楚，而且越搞问题越多，越多越提高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

现在，我再回过头来讲，就是佛教传入中国，据我的认识，有一个媒介。可能就是这个吐火罗人。当然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还可能有什么别的，我们现在不知道。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现在的水平来讲话。有什么证明呢？这里我举几个例子。

第一个，佛字。我们现在叫佛，它的原文呢，是 Boud。这是梵文字。用拉丁字母写的。关于这个字，解放以前，我们原来的师范大学校长陈垣，陈老先生，跟胡适打了一场激烈的笔墨官司，就关于这个字。按中国的习惯，按汉语的习惯，缩写在汉语里多极了。如落实政策办公室，叫落办。这种缩写多极了。我们喜欢这个。过去也这样，过去认为菩萨、活菩萨，原文是 bodhisattva 译作菩提萨埵。结果，我们给它省略了。有一个特殊的规律，把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给省掉了。光剩下一个“菩萨”。无论怎么样罢，我们总是喜欢省略。“僧”，原文为“僧伽”，“伽”字省掉，留一个。四个字的留两个。或者留前两个，或者留第一、第三。这种事情是多极了。现在也是很喜欢省略。一些美籍华人，回来以后，中国话还能讲，就是报纸看不懂。省略字太多了。我们每天都在看。他们不懂，多极了。什么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。现在当翻译很困难。遇到这种词，你没法翻。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，反什么东西？你得给他们讲。不讲明，说不清楚。所以，有一种规律，就是原来字多的，后来讲究把他们省略掉。那么这个佛呢？是不是也就是这样的？我刚才讲的陈垣跟胡适争论的，就是这么个问题。“佛陀”是佛的延长么？或者，“佛”是“佛陀”和 Buoda 是对应的，两个音节，后来省略掉了，陀字省掉，光剩一个佛字。结论是佛陀的省略。

还有一个可能呢，就是佛陀是佛的延长。原来就是佛，后来因为缀了梵文，加了个“陀”。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？按一般人的看

法，中国的习惯就认为佛是佛陀的省略。因为合乎我们的规律。我们习惯于省略些字。只留一个，或者只留两个。看起来毫无问题。可是，问题也不那么简单。就这个问题，我写过一篇东西，还是解放前写的。写《佛陀与佛》。讲这个问题。看起来证据还过得去。就是，佛陀是佛的延长，不是佛是佛陀的省略。从那里来的呢？就是从吐火罗语。焉耆语，佛是 Pit。龟兹语是 Put。是一个音节，我们的“佛”也是一个音节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的，而是从焉耆语，或者龟兹语来的。至于详细情况，我这里就不讲了。同志们如果有兴趣，可以看看《佛陀与佛》，那里边我讲了这个问题。

这问题，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。可是问题并不小。就是，汉语中最早的佛教名词，都不是从梵文翻译过去的。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来。最早关于佛教的名词，关于印度的地名，都不是从梵文翻译过去的，而是通过焉耆文、龟兹文。

后来，唐僧，即唐玄奘，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学者，一个旅行家。不过他也有点主观主义。他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，常常对某一名词，说是“讹也”，错了。实际上不是，他大概没有研究过焉耆语。

自从焉耆语和龟兹语发现以后，我们就有了科学的证明、科学的依据，说明佛教到中国来，不是直接的，最初不是的（后来直接了），而是通过媒介。这媒介，在今天我们知识水平允许的范围内，就是吐火罗语。或者焉耆语，或者龟兹语。这种说法，不知道同志们同意不同意？这种例子，我还可以举那么几十个。不要再举了。

上面，从两个方面我解答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吐火罗语的发现，就是焉耆语和龟兹语的发现，对于我们学术界，对中国、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？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进行研究？我想从这两个方面说明。这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。今天就讲这么两个。同志们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还可以讨论。

由于时间关系，吐火罗语就讲这么多。